

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

高 燎

【提要】 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肇始于对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发展道路的现实反思,是20世纪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讲座派与劳农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日本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矛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蔚然壮大,以地主制研究为代表的乡村史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的显学,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乡村史学者在既有领域深入的同时开拓出农民运动史、自治村落论等多元路径,研究范式受到修正。20世纪末,乡村史研究盛极而衰,渐趋碎片化,退为隐学,但呈现注重市场因素等新趋向。乡村既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剖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关键词】 唯物史观 日本乡村史 资本主义论争 地主制

近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转型与乡村变迁是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近代日本的传统小农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压力下,又被卷入“开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乡村陷入内外双重困境。日本应对近代危机的赶超型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赖肖尔视为“落后国家的榜样”,^①乡村问题是其缩影之一。地税改革后,乡村成为日本近代化初期国家发展支柱之一,但短时间内的高强度社会动员又滋生出包括乡村贫困、农民运动、右倾保守化等社会问题。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就对同时代的日本乡村有所关注。^②彼时研究多是译介,作为本国改良或革命的现实参照,从历史学角度审视近代日本乡村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一良率先从农民运动切入做出开拓性研究。^③万峰、汤重南、王新生、王振锁、周维宏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相继涌现。^④21世纪以来,郭冬梅、文春美、温娟等学者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⑤

日本学者对作为本国史的近代以来乡村变迁有着持续的关注。二战前小野武夫从社会经济史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近代转型期乡村组织化机制研究(1889—1918)”(项目编号:21CS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卞崇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页。

② 日本独逸学协会编《自治论》,谢冰译,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孔雪雄编《日本之农民运动》,南京正中书局1933年版;张天放:《日本农村调查报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江坂佐太郎《日本的新农村》,黄重建编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千石兴太郎《日本农村合作运动》,孙鉴秋译,中国合作学社出版社1936年版;赵楷《日本农业经济》,中华书局1937年版。

③ 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④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汤重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地税改革》,《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新生《试论日本的地主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历史》1986年第8期;王新生《英国和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地主政治》,《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⑤ 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文春美《二战前日本农业问题与政党内阁的农业政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温娟《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角度开创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受到重视,成为判定近代日本社会形态、制定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主要论据之一;二战后在古岛敏雄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长期耕耘下,乡村更是成为阐释近代日本发展困境的关键,奠定日本近代史主流叙事模式中的乡村部分,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乡村史成为日本历史学重要领域之一。

中国的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早期多关注地税改革、寄生地主制等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关系,随后逐渐扩大到农业政策、农村工业化、地方自治等方面,研究视角以探讨日本近代化经验教训或溯源日本作为二战亚洲策源地的乡村根源为主。尽管已有一定积累,但这些研究较为零碎、片段、局限,对近代日本乡村史兴起及演变的理解还不充分。本文尝试梳理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的兴衰历程与社会背景,分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

中文学界的乡村史,在日文中多被称为农业史、农村史、农政史或农史。该领域涉及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形成农耕社会的弥生时代之后的各历史时期,研究对象包括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各方面。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以明治维新以降为研究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乏曲折的发展历程。日本学者对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经济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下逐渐兴起,20世纪30年代一度作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主要论题兴盛一时,为二战之后的体系化研究奠定学术基础。

日本近代史若从1853年黑船来航算起,到1945年二战战败共历九十余年,发生在这一时段的乡村史对于二战前的日本学者而言,首先是现实问题,之后才逐渐化为历史问题。在维新三大口号之一的“殖产兴业”目标下,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推行地税改革等改变乡村社会面貌的诸多新政,官方编纂了资料性出版物,如19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版《大日本农史》《大日本农政类编》《劝农局沿革录》《农商务省沿革略志》等作品,这被本庄荣治郎称为近代日本乡村研究的官修时代。历经西学东渐下的文明史、民间史学、学院史学的发展,^①日本的传统史学也在“维新”中呈现新貌。特别是明治与大正时代之交,日本步入近代转型矛盾多发期,经济危机、社会问题频发,作为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的最高峰”的社会经济史兴起。^②这一学派“运用经济学的观点,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阐明历史发展”。^③代表人物有京都帝国大学的内田银藏、本庄荣治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福田德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当时日益陷入疲敝状态、租佃纠纷频发的日本乡村,小野武夫、黑正岩、板井申生、高桥龟吉等学者是社会经济史当中乡村史的早期开拓者。到二战前后,日本历史学界正式以明治初期农业史的名义,将相关内容列为研究领域之一。^④至此,作为现实政治、经济、社会课题的近代乡村问题研究得以历史学化。

小野武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小野出身农家,原本是一名农学校代课教师,日俄战争后相

① 远山茂树、佐藤进一编《日本史研究入门》,吕永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6页。

② 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与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38页。

③ 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与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第435页。

④ 小池基之「第一部 日本社会経済史」·「農業史(明治初期)」,社会経済史学会編『社会経済史学の発達』,岩波書店,1944年,35—54頁。

继就任于农商务省、帝国农会,攻读法政大学学士学位,凭借对永佃制度的调查研究得到学界认可,获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现实的农村问题、农民运动为研究出发点,撰写出日本永佃制度调查报告;^①第二,在调查基础上,追溯当时日本乡村问题的历史源头,奠定近世、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的基础,代表作有《日本村落史考》《维新农村社会史论》《日本村落史概说》;^②第三,汇集整理日本各地的乡村史料,包括《德川时代百姓一揆丛谈》《近世地方经济史料》《日本农民史料聚萃》^③等作品,为后学开辟道路。

小野武夫着眼于20世纪初日本“农村问题的焦点”^④——层出不穷的租佃问题,从“过去之经济现象常与其时代社会之诸相对照,相互关联”^⑤出发,考察了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农民永佃惯行的形成,将其与明治维新后土地私人所有的法律之间的龃龉视为租佃纠纷产生的根源,强调明治维新作为“日本国史上空前的社会变革”,其政治制度上的骤变与农村经济的缓变,二者错位引发包括农民暴动在内的“社会经济变动期的阵痛现象”。^⑥这些看法隐约地折射出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朴素认识。

在对农民运动的研究上,小野引入了“阶级”话语,将封建社会末期德川时代的一般农民分为“纯农民及农民色彩浓厚的阶级”与“具有非农民色彩的阶级”两大部分,并对其近代变迁进行考察。前者内部的地主与佃农两个阶级在明治维新后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地主阶级因获得土地经营的自由与所有权的法律保障而成为“上层阶级”,甚至将土地资本化,退化为寄生地主;与之相对,佃农阶级彻底变为“资本主义地主”下依然“劳役”的土地租用人,并未获得经济上的解放。^⑦这种现象被小野称为“土地资本主义”在近代日本的确立,造成社会阶级的分裂,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佃农觉醒后发起“克上运动”的“萌芽的温床”,以“扩张自己的人权及物权,重新建立租佃制下的经济组织”。^⑧小野的这种阐释方法反映出社会经济史学“承认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重视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已为无产阶级史学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⑨社会经济史学成为日本唯物史观的先声。但是在对租佃纠纷等农民运动的解决对策上,小野武夫主张通过法律的修订等改良主义的方式,认为“纵使佃农抬头,但只要土地资本家的社会性实力与气魄依然旺盛,那么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事实”。^⑩这表明了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的局限性。

与社会经济史学对乡村问题分析的不彻底性相比,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后半期便传入日本,河上肇是较早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⑪但直到1922年唯物史观才首次被佐野学用于对日本历史的解释,经本庄荣治郎、黑正岩、福本和夫等人的发展,“唤醒了

① 小野武夫『永小作論』、巖松堂書店、1924年。

② 小野武夫『日本村落史考』、刀江書院、1926年『維新農村社会史論』、刀江書院、1932年『日本村落史概説』、岩波書店、1936年。

③ 小野武夫編『徳川時代百姓一揆叢談』(上・下冊)、刀江書院、1927年『近世地方經濟史料』(全十卷)、近世地方經濟史料刊行會、1932年『日本農民史料聚粹』(全十二卷)、巖松堂書店、1941—1943年。

④ 小野武夫『農村研究講話』、改造社、1925年、21頁。

⑤ 小野武夫『永小作論』、357頁。

⑥ 小野武夫『維新農村社会史論』、44—45頁。

⑦ 小野武夫『維新農村社会史論』、281—318頁。

⑧ 小野武夫『農村機構の分裂過程』、改造社、1928年、43—63頁。

⑨ 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与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第440页。

⑩ 小野武夫『農村機構の分裂過程』、61頁。

⑪ 贾纯《河上肇与唯物史观》上篇,《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4期《河上肇与唯物史观》下篇,《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期。

对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的反省与批判”。^① 这些学者将唯物史观中的五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等应用到对日本历史的解释中,具有鲜明的移植性、战斗性和现实性。^②

围绕对明治维新、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分化为讲座派与劳农派,^③进而提出不同的政治纲领与革命路线。^④ 两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出发,争论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明治维新实施地税改革后形成的土地所有关系、租佃关系,这被认为是判定近代日本社会性质与阶级斗争革命路线的关键。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分为两轮,第一轮起于1927年猪俣津南雄等劳农派知识分子自立于日共中央之外。从这时到1929年,两派围绕“日本资本主义封建性的问题”展开论战,主要观点集结于猪俣津南雄的《现代日本研究》与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⑤ 1932年起讲座派编发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引燃双方第二轮论战,尤以被视为“讲座派理论最高峰”^⑥的山田盛太郎所著《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为焦点。

在论战过程中,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讲座派认为,在近代日本土地私有制下,政府向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征收34%的货币地税,地主向佃农征收68%的实物佃租,这是压榨小农的“经济外强制”,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封建遗存。^⑦ 讲座派推论近代日本是天皇制权力下的军事性、半封建性显著的社会,认为地主制下的土地所有关系是“半农奴制的零细农耕”。^⑧ 劳农派则强调地税、佃租的高低不能作为判定地主制及近代日本社会性质的标准,并指责讲座派的观点缺乏实证,分析方法中使用“固定化的概念”而没有发展性的观点。^⑨ 尽管两派存在观点分歧,但对土地分配不均的认知一致。两派的论战在未能得出妥协性共识的情况下,受到日渐凸显的日本法西斯的迫害,逐渐销声。

这场论战明显受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⑩这一论断的影响,是继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俄国资本主义后,又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本国发展问题的阐释。这种尝试虽显得较为生硬与稚嫩,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讲座派站在贫苦小农的立场上,指出通过革命消灭寄生地主制的必要性,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启发日本社会各阶层思考变革国家命运的途径。在讲座派与劳农派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唯物史观在各大大学经济学部、农学部扩大学术影响,确立近代日本乡村史的研究框架与价值取向,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史学、“皇国史观”等观点争夺话语权,成为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的火种,推动了日本历史学的发展。

① 北山茂夫「日本近代史学の発展」、家永三郎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2別巻(1)』、岩波書店、1963年、118頁。

② 张世均《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两派分别以各自代表性出版物《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与《劳农》而得名。“劳农”是日文表达,对应中文应为“工农”,鉴于中文学界已习惯直接使用“劳农”一词,本文亦沿用此译法。

④ 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87页。

⑤ 猪俣津南雄『現代日本研究』、改造社、1929年;野吕荣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鉄塔書院、1930年。

⑥ 内田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争』、清和書店、1937年、148頁。

⑦ 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に於ける再生産過程把握』转引自内田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争』、101頁。

⑧ 安孫子麟「寄生地主論」、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第9巻 日本史学論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151頁。

⑨ 内田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争』、157—158頁。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8页。

二

二战后,日本政治家借力盟军总司令部,推行改革,促成了日本史上所谓的“第二次开国”。以乡村为例,1946—1950年的农地改革使土地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38年,租佃地占全日本耕地面积的46.8%,自耕地仅占53.2%,而在农地改革即将完成的1949年,租佃地占比减少到13%,自耕地增至87%。自耕农与佃农占农家户数比例从1941年的53.8%和46.2%,变为1949年的86.9%和13.1%。^①1945年的244.8万公顷租佃土地的80%在改革中由政府强制收买转让给佃农。^②困扰战前日本小农生计的土地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

获得“恒产”的小农变为盟军眼中不再可能追随军国主义分子的社会稳定力量,加之限制土地流转等政策,小农家庭经营为主的自耕农体制在战后日本扎下根来,形成与战前寄生地主制截然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善了农业生产关系,在政治与经济上支撑着新日本的和平与发展,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日本历史学者再次直面战前资本主义论争的课题,关注历史中土地制度、主佃关系的实况,掀起农村调查热,“寻求对实际问题的结构性理解,进而找出解决方案”。^③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实证支撑下获得新的发展。

二战后初期的乡村史研究,围绕地主制的形成与变化展开,探讨土地制度的变迁,推动地主制历史研究成为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流。^④在近代乡村史研究壮大的过程中,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是1948年6月26日土地制度史学会在东京大学创立。在此之前,还存在一个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土地制度资料保存会,由农林省每年提供50万日元资助,1946年成立。该会“进行土地制度资料的汇集、整理、保存,助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之圆满快速地实现,以促进民主主义日本之再建为目的”,1949年4月自动解散。^⑤

相对于资料保存会,土地制度史学会是比较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但在研究课题与研究人员构成上,二者非常接近,因此资料保存会被视为该学会事实上的“母体”之一。^⑥学会从1950年起举办学术年会,并在年会上举办主题报告,主题包括从封建制向资本制的转移——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成立(1954年)、变革期的地租范畴(1955年)、绝对王权成立的客观性诸条件(1956年)、资本主义成立期的土地制度论与经济学体系(1957年)等。1958年,学会创办发行季刊《土地制度史学》。^⑦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自此诞生。

截至1960年前后,农村史或农业史研究构成明治经济史研究的主流。^⑧代表学者古岛敏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最初专攻近世及以前的乡村史,但在二战后特殊学术环境下转向近代史,培养出中村政则、西田美昭等后继人才。他先后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著《寄生地主制的生成与展开》《商

① 王新生《战后日本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3页。

② 暉峻衆三編『日本農業史:資本主義の展開と農業問題』,有斐閣,1992年,249頁。

③ 古島敏雄・福武直編『農村調査研究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1—2頁。

④ 加藤幸三郎『近代史研究解説・経済』、『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7 近代4』,岩波書店,1962年,333頁。

⑤ 細貝大次郎『山田先生と農地改革』、『土地制度史学』第24卷第1号,1981年,31—44頁。

⑥ 土地制度史学会と政治経済学・経済史学会編纂委員会『60年のあゆみ』、『歴史と経済』2008卷増刊号,2008年,9頁。

⑦ 山田盛太郎『創刊のことば』、『土地制度史学』第1卷第1号,1958年,1—2頁。

⑧ 加藤幸三郎『近代史研究解説・経済』、『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7 近代4』,339—341頁。

品生产与寄生地主制》《日本地主制史论》《日本地主制史研究》《养蚕业的发展与地主制》等作品。^①这些著作利用统计资料定量分析各地的租佃土地率,试图归纳地域类型,寻求地主制的典型。1954年日本历史学研究大会封建部分会议将主题设定为“寄生地主制的诸问题”,围绕寄生地主制的源头是否能够上溯到江户幕府后期,以古岛敏雄为中心的“寄生地主制论争”成为日本经济史研究的主题之一。^②

值得注意的是,古岛的研究多采取跨学科、多学者共同研究的方式。以《寄生地主制的生成与展开》为例,该书基于对京都府乙训郡久我村的实地历史调查撰写完成,某种意义上具有调查研究报告的性质。该书以农民阶层分化为中心,勾画出这一近畿村落地主制的成立、展开、寄生化、衰退与解体的较长时段变迁。^③研究团队包括古岛敏雄、永原庆二、福武直、晖峻众三等12名学者,从中世史到近代史,从历史学到社会学,包罗甚广。这种共同研究体现出同一时代研究者共通的学术关注,是当时近代乡村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古岛以外,下山三郎、丹羽邦男、守田志郎、大石嘉一郎、安孙子麟等人也对19世纪后半期寄生地主制在日本的确立进行了丰富的实证与理论探讨。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与佃农等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与租佃关系成为分析重点,尤其是明治前期地税改革带来的土地集中、分配不均,而在政治上寄生地主以名望家的身份获得基层政权的名誉职务,被吸纳至资产阶级政权当中,日本特色的阶级史观成形。1962—1964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丛书作为战后历史学的集中反映,“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基本方法”,^④其中的近代乡村史叙事便奠基于上述研究。

这一套丛书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分期编排,与近代乡村史相关的内容分布于“近代”各卷中,包括守田志郎执笔的“幕末·明治初期的地主制与商品生产”、木户田四郎执笔的“维新期的农民一揆”以及安良城盛昭执笔的“地主制的展开”等内容。其中,安良城的论述体现出这一时代研究的特征。他强调半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属于日本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基于翔实的统计数据与调查资料,展示出近代日本农民阶层分化的状况。从1883年到1908年,日本各府县的租佃土地率显著增加,超过50%的府县从原来的只有富山一县增加到大阪、兵库、新潟等十个府县,增幅最快是在1883—1887年,农民的租税负担一度攀升到占大米生产额的39.8%。受此冲击,不少零散小农被迫出售土地,加速了土地向寄生地主的集中;佃农比例不断增加,在1883—1884年就有28个府县的佃农户数占比超过全体农户的一半,小农的破产与地主的壮大构成鲜明对比。地主开始直接将自己的阶级利益诉诸国政,如甲午战争前提出缩减预算、减轻地税、修养民力等内容。^⑤如此,近代日本乡村地主与佃农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就被构建出来。地主阶级被吸纳到帝国议会中,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同时“成为天皇制权力的‘阶级基础’”。^⑥二战后农地改革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得以自洽。

1945年后的日本近代乡村史研究,以现实的农地改革为出发点,产生了土地制度史学会等学术

① 古島敏雄編『寄生地主制の生成と展開: 京都府乙訓郡久我村の実証的研究』、岩波書店、1952年; 古島敏雄・永原慶二『商品生産と寄生地主制: 近世畿内農業における』、東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 古島敏雄・守田志郎『日本地主制史論: 千町歩地主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古島敏雄編『日本地主制史研究』、岩波書店、1958年; 高橋幸八郎・古島敏雄編『養蚕業の発達と地主制』、御茶の水書房、1958年。

② 加藤幸三郎『地主制(確立期)をめぐる諸問題』、『社会経済史学』第31卷第1—5号、1966年、126—136頁。

③ 古島敏雄編『寄生地主制の生成と展開』、『序』i—iv頁。

④ 钱昕怡《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为例》,《日本研究》2020年第2期。

⑤ 安良城盛昭『地主制の展開』、『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6 近代3』、岩波書店、1962年、53—102頁。

⑥ 成田龍一『近現代日本史と歴史学』、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141頁。

团体。在古岛敏雄等人推动下,地主制的实证个案跨学科研究取得较大进步,突出近代乡村农民阶层分化的日本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唯物史观在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中大体完成本土化。

三

1960年后日本迎来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社会结构再次迎来转变。农业产值绝对额仍在增加,但在日本经济整体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8.6%减少到1985年仅2.3%。^①195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日本总就业人口45.1%,^②1980年已跌破10%。^③农业劳动人口流入城市后,老爷爷、老奶奶、老妈妈成为乡村留守主体,以致1963年出现“三老农业”的说法。^④农民、农业、农村在日本社会中存在感降低,“消失”于大众视野中。

日本经济不仅在量上增长,在质的方面也出现变化,近代以来日本工农、城乡间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二重结构”得到改观。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发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志在增加国民整体平均收入,还特别强调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差距,改善不同行业之间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⑤在政府政策、农协活动、农民兼业等条件下,日本农民收入增长较快。1965年日本农户收入已基本与城市家庭持平甚至反超,农民人均收入在70年代初也赶上城市居民。^⑥日本城乡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农民与市民趋于同质化,“一亿中流”意识不仅为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所有,也被生活日益改善的农民所共享,城乡差距的缩小使日本近代以来的绝对“贫农”现象消失。

二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变迁的体现,也投射到日本战后史、当代史的叙事中。现在的日本通史关于乡村的部分,大多只讲到农地改革,而不讲之后的乡村史。最新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现代部分“战时·战后农村的变容”一章中,^⑦二战后的部分篇幅仅有结语展望三页纸,农民从显性变为隐性,逐渐消失于战后史叙事中。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后视的产物,并不代表当时乡村史研究的实况。

农民与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消失”,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生活学、环境学等诸多学科的乡土研究热。以村落社会研究会为例,^⑧60年代其年会主题多与乡村秩序变动有关,如“与城市关联中村落的变动”(1963年)、“村落的解体”(1964、1965年)、“村落中权力构造的变化——村的解体与再编成”(1966年)、“对村落构造变化的动力”(1967年)、“村落构造变化的动力”(1968年)、“村落社会的变动”(1969年)。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赖肖尔等美国学者提出以日本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楷模的“近代化论”流行开来。^⑨乡村史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工业史、城市史取代。学术环境的

① 木村茂編『日本農業史』、吉川弘文館、2010年、362頁。

② 日本经济企画厅调查局编《经济要览》各年版,转引自晖峻众三编著《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胡浩等译,胡浩校,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③ 木村茂編『日本農業史』、359頁。

④ 中村政則『戦後史』、岩波書店、2005年、98頁。“三老农业”的译法参考郭志的《美日反动派摧残下的日本农业》(《人民日报》1972年7月3日)与王振锁的《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日文为“三ちゃん農業”。

⑤ 『国民所得倍增計画』、経済審議会、1960年。

⑥ 晖峻众三编著《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第131页。

⑦ 森武磨『戦時・戦後農村の变容』、『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9巻 近現代5』、岩波書店、2015年、177—222頁。

⑧ 村落社会研究会成立于1953年,1992年改名为日本村落社会研究学会。

⑨ 中村政則『戦後史』、43頁。

变化,推动乡村史研究范式的修正。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地主制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但在关注时段与具体论断上出现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学者对寄生地主制的关注重点从江户幕末的发端源起,转向明治时期的形成确立。^①中村政则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通过对土地所有与经营规模的区分,指出土地集中存在地税改革到松方财政的资本原始积累期与甲午、日俄战争后的产业革命期两个阶段,租佃土地率从1883—1884年的35.5%增加到1908年的45.5%。^②他着眼于地税与佃租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强调地主制与资本制的关联。

在中村看来,近代日本地主的寄生化不只是既往研究认为的“游离出生产机能,寄生于佃农与佃租”,还包括“第二,作为投资阶级,寄生于产业资本与利润……第三,通过投资国家资本,以向殖民地输出资本为媒介,寄生于殖民地过剩利润与榨取弱小民族的劳动”。^③从这一角度看,地主制的成立期不是安良城盛昭主张的帝国议会开设后的19世纪90年代,而应修正为产业资本确立的20世纪初。在地主制研究的关键问题农民阶层分化上,他指出此前研究对统计资料的使用存在问题,对数据进行修正分析后,无法确认山田盛太郎、绵谷赳夫、大内力主张的地主与佃农的上下阶层两极分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土地所有的压倒性优势与零星农民经营的压倒性劣势构成全日本的基本农业生产关系构造。^④具体到日本各地的地主制,中村注意到东北型、养蚕型、近畿型不同农业地带间的差别。^⑤中村政则修正了既往研究中论证薄弱的论断,勾勒出与近代经济资本密切关联、具有地域多样性的地主制实态,加强了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近代日本乡村史的实证研究。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的战后历史学从经济史逐渐转向收缩为民众史与社会史。^⑥处于修正期的乡村史研究,与民众史相结合,作为地主制研究的扩展,在农民运动史上有所突破。早在二战后初期,农民组合史刊行会、农民运动史研究会等团体与一些学者就已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史料的收集。^⑦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通史性的农民运动史、农民团体史外,“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积累”。^⑧既往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包括租佃纠纷在内的农民运动是由贫农发起,目标是同工人运动一起推翻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天皇制。^⑨在中村政则提出的地主制衰退期问题意识启发下,林宥一、西田美昭等人^⑩推动农民运动史的研究,结合地方实例进行具体考察,廓清运动主体并非狭义的底层贫农,而是更加广泛的中下层农民。80年代后,野田公夫、庄司俊作、大门正克、森武磨等人持续耕耘这一领域,探讨农民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乡村社会转变、农村

① 星埜惇「地主制史研究の問題点」、『土地制度史学』第26卷第2号、1984年、50—57頁。

②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122頁。

③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80頁。

④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133—141頁。

⑤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141—176頁。

⑥ 戸邊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22巻 歴史学の現在』、岩波書店、2015年、156頁。

⑦ 稲岡進『日本農民運動史』、青木書店、1954年;杉山元治『日本農民組合運動の話』、農民組合史刊行会、1956年;農民組合史刊行会編『農民組合運動史』、日刊農業新聞社、1960年;農民運動史研究会編『日本農民運動史』、東洋経済新報社、1961年;青木恵一郎『日本農民運動史』(全6巻)、日本評論新社、1958—1970年。

⑧ 林宥一「農民運動史研究の課題と方法——地主制、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の関連」、『歴史評論』創刊300号記念(特集 現代歴史学の課題)、1975年、199—215頁。

⑨ 森武磨『戦時日本農村社会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5—7頁。

⑩ 林宥一「初期小作争議の展開と大正期農村政治状況の一考察」、『歴史学研究』442号、1977年、1—16頁;西田美昭編『昭和恐慌下の農村社会運動:養蚕地における展開と帰結』、御茶の水書房、1978年。

中坚人物更替、法西斯体制形成的关联。其中,庄司俊作与森武磨的研究影响很大。

庄司俊作注意到,以1924年《租佃调停法》的出台与实施为契机,日本政府介入地主与佃农之间纠纷的解决,由三方共同组成租佃调停委员会,通过斡旋,地主让渡出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保障佃农的土地租佃权。他将这一机制称为“协调体制”,认为它是石黑忠笃等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革新官僚主导下的改革产物,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对农民运动在部分地区的消退起到一定作用,成为后来战时农地调整、战后农地改革的先声。^① 森武磨认为农民运动的衰退不能完全归因于“协调”,日本政府在农村支配方式上的改变也发挥了相当作用。为应对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带来的昭和农业恐慌,日本政府通过扩充作为战后日本农协前身的产业组合,改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的处境,农民利益得以维护的同时也被吸纳到政府一侧,不仅成为二战时法西斯体制与战争动员的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战后日本的乡村政治版图。^② 庄司俊作和森武磨虽然观点不同,但都从历史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出发,对以往阶级斗争史视域下的农民运动消退的原因提出新诠释。

最后,无论是地主制研究,还是农民运动史研究,都是基于唯物史观对地主与佃农社会关系的探讨,但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解释近代日本乡村史的所有问题,村落共同体研究视角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早期的研究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大塚久雄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指出包括日本村落在内的各种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是商品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立的障碍,必将在近代化过程中解体。^③ 大塚等人以西欧近代化为标准审视日本传统社会的方法,在战后知识界集体思考近代日本失败原因的环境中相当有市场,但20世纪60年代后转而肯定传统村落共同体在近代日本转型中作用的学者日益增加,其中包括作为民众思想史研究引路人的色川大吉。

色川早在对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中,从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出发,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空间,观察到作为明治政府消灭对象的部落共同体成为“抵抗权力的据点”。他在梳理小地域共同体的近代变迁时,高度评价村落共同体是“历经数个世纪,凝结底层人民睿智的结晶,通过无数失败的经验和惨痛的牺牲,不断思考创造出来的极富活力的结众样式”。^④ 这预示着村落共同体作为分析近代日本乡村史视角的可能性。

斋藤仁将村落共同体称为“自治村落”,将其应用到农业经济史分析中,开辟了既往地主制研究以外的另一种范式。不同于他人以先验的“村落”开展研究,斋藤将日本村落定义为“拥有特定的领域和领民(成员),对其领域及领民行使某种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拥有独自的财政权、财产权的组织”,指出明治大合并而成的行政町村“不过是将部落变为它的一种下级机关”,“带有部落联合体的性质”。^⑤ 他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农村协同组合运动,还是以租佃纠纷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都是以传统的村落社会为组织基盘,无外乎展现出作为小农共同体的村落社会所具有的组织性”。^⑥ 斋藤

①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農村社会の展開—国家と農村—』、ミネルヴァ書房、1991年、90—101頁;庄司俊作『近現代日本の農村:農政の原点をさぐる』、吉川弘文館、2003年、106—110頁。

② 森武磨『戦間期の日本農村社会』、3—10頁。

③ 高华鑫《日本思想研究关键词:共同体》,《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年第6期。

④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黄河書房、1964年;色川大吉『近代日本の共同体』、鶴見和子・市井三郎編『思想の冒険:社会と変化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筑摩書房、1974年、240頁。

⑤ 齋藤仁『農業問題の展開と自治村落』、日本經濟評論社、1989年、32頁。

⑥ 齋藤仁『農業問題の展開と自治村落』、1頁。

提出的“自治村落”在解释近代日本乡村的地方自治、经济组织、农民运动等问题时均有一定说服力,得到庄司俊作、坂根嘉弘等学者的接受,逐渐衍生出强调乡村地缘共同体的“自治村落论”一派,丰富了乡村史研究的视角。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学术兴趣呈现多元化特点,原有研究范式受到挑战。既有中村政则那样在地主制研究学统上继续深耕、修正已形成的日本学界阶级史观通说的学者;也有从地主制研究扩展到农民运动史、将乡村史研究时段从明治时代推进到大正昭和时代并关注实际运动主体的学者;还有不囿于分裂乃至对立的阶级关系,而以地缘村落共同体来重审乡村史的传统与变迁的“自治村落论”的学者。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范式不再定于强调主佃冲突的地主制一尊,而以更为宽广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乡村变迁的多面性。无论是农民运动史还是自治村落论,都以对乡村底层民众与空间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用丰富的微观个案事例、人物充实以往的宏观统计数据。

四

1989年日本迎来“平成时代”,数年后泡沫经济下日本的“耀眼”时代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是20世纪末日本社会开启新一轮转型。民众生活方式逐渐从大量消费、大量浪费转变为适度消费的低欲望社会,日本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日本乡村,对外面临世贸组织成立后国际农产品市场开放带来的挑战,对内则受困于长期以来的过疏化、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农协及农业改革成为日本亟需解决的新难题。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乡村史研究涌现出《近代日本的行政村》《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展开》《行政村的执行体制与集落》《主产地形成与农业团体》等一大批成果。它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线的战后历史学基础上,受国民国家论等学说影响,实证探讨近代日本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乡村基层,如何重塑乡村社会。这些研究虽然不再直接探讨社会性质等问题,但强调近代日本乡村社会的不平等性与天皇制支配下的压迫性。^①

与此同时,日本的乡村史研究也步入拐点。在日本近代史中,乡村史的关注度下降,直接体现为日本主流综合性史学杂志《历史学研究》《日本史研究》《日本历史》《社会经济史学》等刊发的乡村史论文数量逐年减少。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微观,从重视“体制性”变为“个别具体性”,专业极度分化,研究者之间失去共通的问题意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学者的代际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近代乡村史研究硕果是二战后日本学者不断传承与积淀的产物,他们多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正是日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转型期的自身社会经验还能让他们足以理解老一辈学者关心的学术话题。而八九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兴趣已发生变化,像土地制度史研究便失去往日的吸引力。

造成这一学术发展困境的根源,不仅是表面的代际更替,更重要的是二战后发展带来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坂野润治敏锐地觉察到:在战前日本,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还是社会上的平等,都没有获得真正实现;战败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左翼活跃的时期,日本社会科学将社会不平等理解为“阶级关系”;但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等因素,否定“阶级社会”在过往历史中存在的观点日渐突出;在近代日

^① 玉真之介「地主小作関係:階級関係か、市場関係か、迫られる視点の転換」、『農業史研究』第31・32巻(一九九七年度シンポジウム『近代日本地主制・地主的土地所有に関する回顧と展望』—近年の研究を中心として—)、1998年、41—54頁。

本史研究中,不要说观点或方法,甚至连使用“阶级”“阶级关系”的论述都销声匿迹。战后的“一亿中流”社会现象改变了日本近代史的叙事与研究。^①这一观察放在乡村史研究上也是贴切的,研究的聚光灯逐渐偏离近代地主制下处境窘迫的小农。“阶级史观”的淡褪成为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史学界的共通趋势。

此时的代表学者玉真之介的研究显示出上述特征。他考察系统农会时,打破既往“地主的团体或农政的承包实施机关”的阶级式认识,^②聚焦近代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以“仙台白菜”等蔬菜的消费市场与主产地的形成为例,探讨小农如何在有限的农地经营规模中应对经济转型带来的市场挑战。玉真之介重点分析系统农会发挥的贩卖斡旋作用,揭示其联系小农与市场的功能,从市场角度而非既往的地主支配视角出发,尝试回答租佃纠纷衰退的原因,表现出从“土地问题史观”向“市场问题史观”的转换。玉真之介的研究并非完全否定过去的乡村史研究范式,他指出“地主佃农关系既是阶级关系,也是市场关系”,^③要看到农业技术、市场应对、农业团体与生活方式等多样化的乡村史问题。

2002年10月,土地制度史学会成员大会通过决议,将学会名称改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会”,学会期刊《土地制度史学》从第45卷起改称《历史与经济》,以应对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状况与学术状况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④该学会的转型是日本乡村史研究环境转变的缩影之一,之后乡村史研究的主要阵地逐渐转移至1975年创立的日本农业史学会。近代乡村史研究呈现“再兴”的新动向。^⑤在日本国内外学术潮流的影响下,日本乡村史在开发经济学与东亚比较、^⑥战时乡村统制、牲畜史、食物史等方面有所发展。

纵观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唯物史观对小野武夫、山田盛太郎、古岛敏雄、中村政则、庄司俊作、森武磨、斋藤仁、玉真之介等一代代学者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自二战前社会经济史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诞生以来,从早期土地制度性质的讨论,发展到战后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主流的地主制研究,再到60年代后多元研究路径的开拓,以至90年代的鼎盛与转折,都能看到唯物史观基本论点的存在。这一领域始终关注乡村底层民众的命运,侧重农业史,关注生产力发展,贯彻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分析方法,确立起叙事与分析框架。即便晚近基于阶级史观的研究减少,但这并非对其进行否定,而是视野与内容的扩充。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的流变,从起于现实农业问题的性质之争,到农地改革引发的土地制度史、工业化时代乡愁牵连出自治村落的“想象”,再到“一亿中流”淹没“阶级”的话语,陷入“碎片”的汪洋,每个阶段都反映出日本当时的社会特点。

(作者高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坂野潤治『〈階級〉の日本近代史:政治的平等と社会的な不平等』、講談社、2014年、7頁。

② 野本京子「農会史研究の動向:一九七〇年代以降」、『農業史研究会会報』第16号、1984年、13—19頁。

③ 玉真之介「地主小作関係:階級関係か、市場関係か、迫られる視点の転換」、41—54頁。

④ 政治経済学・経済史学会ホームページ。https://seikeisi.ssoj.info/peehs.htm[2021-10-08]

⑤ 小島庸平「近年における近現代日本農業史の「再興」をめぐる」、『同時代史研究』第8号、2015年、68—74頁。

⑥ 坂根嘉弘「新動向 農業史」、社会経済史学会編『社会経済史学会創立80周年記念 社会経済史学の課題と展望』、有斐閣、2012年、361—373頁。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d twice offered concrete directives requesting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the guiding ideology in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ith a constitutional nature stipulated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the only scientific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view in all walks of this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Since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y discipline, including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has been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and the Soviet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West, China's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faced some problems after the mid-to-late 1980s, such as the confusion of historical view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gue position and unclear standpoi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rapid Westernization of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uphol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Marxism, especially the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oing so, we can place ourselves on the fron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draw 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iography // Gao Liao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y took its roots in the rethinking of modern Japan and w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rise of the fiel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Kouza-school and the Rono-school appli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ing the nature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Debate on Japanese Capitalism. After the 1960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Japan, rural history researchers not only continu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fields but also explored various new themes such as peasant movements and autonomous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were subsequently revised.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earch on rural history declined right after its flourishing, gradually fell into a state of fragmentation, and became marginalized.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new trends started unfolding, such as an emphasis of market factors. Rural society is not only an unavoidable and important subject in Japan's modern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 key entry point of Marxist studies of Japanese-style capitalist society.

Rethinking Neo-Colonialism // Bi Jiankang

Neo-colonialism has long been a heated debate issue among scholars. While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been criticizing neo-colonialism through various approaches, scholars in China are also debating this concept. After the World War Two, neo-colonialism evolved from old colonialism, and shaped new coloni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is is what Kwame Nkrumah conceptualized, the realistic basis of classical neo-colonialism. In the 1970s and 1980s,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o-colonialism had undergone some major changes. This "developmental neo-colonialism" is what colonialism has become of under the neo-liberalism during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eriod. Ample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logic have fully proved that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eo-colonialism.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Rise of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1873 - 1940) // Hong Yuqing

After Serbia gain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 vital debate on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s, concepts, and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broke out between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former support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folk epic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latter supported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ebate lasted for almost 20 years and ended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Critical School. This gave birth to the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lthough the two schools differed in their approaches, they were in fact consistent in their focus and key narratives of Serbian historiography. It was through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that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embraced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 two schools that it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guid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us establishing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